

【笔 谈】

多学科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¹

笔谈策划人：严庆；主持人：马忠才

编者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研究的重大议题。这一议题内涵丰富，兼具学理性和实践性，意义深远而又充满挑战性。这方面的研究涉及面广，纵横交错，往往因时因地而异，可谓机理玄妙，非有一个多学科学术共同体通力合作、长期跟踪、潜心钻研而不得将其研究透彻。学科是对于人类知识体系的划分，而现实社会是一个系统性的整体，许多问题的解决需要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来实现。多学科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可将主题置于更为系统宏阔的学术视野，避免单一学科的诸多局限。多学科交叉融合能为学术进取提供强劲动力，有效的融会贯通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理论突破和实践创新。学科融合也是新文科理念的要义所在，以问题为中心，各学科围绕问题通力合作，互学互鉴，在交叉融合中守正创新。要而言之，加强、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从打造学术共同体走起。为此，严庆教授创意策划，本刊邀请多学科专家参与主题笔谈，并设专题栏目，以期实现星光交彻，集聚智慧，凝聚共识。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学科融合；国家认同；民族主义

美好生活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麻国庆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重要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因此，在民族研究领域，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所揭示的阶段性特征。

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一定要关注当下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的定位。譬如在民族学学科领域，如何理解“美好生活”的概念？其实，我们知道民族学研究一直强调对于少数民族的理解和扶持，包括了解他们的社会结构。我们从20世纪50年代起进行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就是通过重新认定不同民族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进而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国家一些整体性的政策支持，加上当地人的具体努力和实践，少数民族能有一个新的发展。这个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大家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当然，在美好生活的背后，是一个“美好社会”的概念。

费孝通先生早年在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时，也强调要了解人民的社会生活，人类学、民族学要做迈向人民的学问，要为构建美好社会而砥砺前行，所以他在很多年前就强调“美好社会”的概念。美好生活和美好社会都是我们追求的理想目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因为中国的区域很大，存在多民族、多文化传统的历史与现实，东部、中部、西部发展不平衡。如何把发展不平衡的区域调动起来，使那些生活在其中的人民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让他们的生活能够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具体而言，就是东部、中部、西部应该协调起来，包括我们现在的精准扶贫，实际上就是扶持发展滞后的区域和群体，这样就能解决不平衡、不充

¹ 本文发表于《西北民族研究》2020年夏季刊（总第105期），第 页。

²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



分的发展带来的矛盾。而实现共同富裕、共创美好生活的未来，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通过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达到“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目标。

费先生后来在对中国现实社会不间断的调查、实践和反思中，在富民理念的基础上发现了“心态秩序”在构建美好社会中的重要性。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域看，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心态秩序建设是非常重要的环节。2015年9月30日，在新中国成立66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邀请来自全国5个自治区的13名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齐聚北京参加国庆活动。在会上，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本身就是家国情怀的表达。其中，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亲”是一个核心概念。费孝通先生曾说：“中国社会的活力在什么地方，中国文化的活力我想是在世代之间。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多么重要，要紧的是光宗耀祖，是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孩子。”还说：“看来继承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世界上还没有像中国文化继承性这么强的。继承性背后有个东西也许就是kinship，亲亲而仁民。”费先生说“亲亲而仁民”，强调“亲”的概念在中国的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再如中国的“亲等”概念、亲疏关系等等，如果把这些“亲”的概念上升到一种情感上的亲，它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亲疏关系上的“亲”，而是各民族在一个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亲”。这就是把小家之亲，差序扩展到国家之亲、中华民族之亲。

那么，民族之间如何做到在情感上比较亲近？通过哪些方面可以表达出民族间情感上的亲近？比如新疆阿勒泰地区有一位维吾尔族的老妈妈叫阿尼帕·阿力马洪，她的爱没有民族之分，创造了一个温暖的家。她抚养了自己的6个弟妹，生育了9个儿女，还收养了汉、回、维吾尔、哈萨克4个民族的10个孤儿，帮孩子们成家立业，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在情感上相互亲近。现在这个家庭已经扩大到由6个民族（维吾尔、哈萨克、塔塔尔、回、乌兹别克和汉）的200多口人组成。她被评为200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2009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评选组委员授予她的颁奖词是：“不是骨肉，但都是她的孩子。她展开羽翼，撑起他们的天空。在她的家里，水浓过了血，善良超越了亲情，母爱最美。”总之，阿尼帕妈妈的事迹正是家国情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真实写照。由此可见，“情感上相互亲近”“人心”或者说社会心态应该成为民族研究的重要领域，这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态秩序的重要概念。从学理上来看，社会学、民族学研究都需要重视心态与情感的研究。

今天，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地推进，并越来越深地融入全球化体系中，原本由国家和民族所设定或隐喻的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界限，不断被越来越频繁的人员、物资和信息的流通所穿越。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众离开家乡，成群结队地到异地工作，追求美好生活，形成所谓“流动的民族”；另一方面，来自内地的信息、物资和人员也源源不断地流入少数民族地区。这种双重的穿越使得我们国家与民族框架的核心部分发生着深刻变化。因此，以东、中、西来简单区分民族的界限已成为过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把流动的民族、流动的人口等纳入研究领域之中，这是民族学研究的现实领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知识创新

关 凯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在于增强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既是一种政治规范，又是一种对于共享公民身份意识的主观性集体表达。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国家就是一个范畴比较大的社会单位。对于中国来说，历史延续的疆域，内部包含的多样化的次级社会单位，构成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本结构。那些在范畴上低于/小于国家的社

¹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会单位，比如在族群、宗教、地方性的以及职业性的群体当中，“民族”是很特殊的一个。因为，民族通常被人们想象为是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自我发育”出来的，具有“原生性纽带”（primordial ties，格尔茨语）的特质，像家庭、宗族这类血缘组织一样，天然具有情感化倾向。而现代国家是基于理性、科层官僚、法律制度和社会分工人为构建起来的复杂政治组织，其精神气质是高度理性化的。

社会成员通常能够在国家认同和更细分的群体认同之间保持一种甚至是不自觉的协调，但同时也可能因为某种环境的变化，在某些特定的条件或情境下将对于自身归属的族群认同提升到国家认同之上，从而制造出“单一身份的幻象”（阿玛蒂亚·森语），进而产生去国家化的身份意识，伤害个体层面的国家认同。这就使得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国家认同都始终处于一种理性的构建过程当中，它既包含相对稳定的、结构化的一面，也有动态变化的一面，与社会情境的具体变化和个体能动关联甚大。

从民族研究的视角出发，民族问题有两个主要的分析维度：一是民族之间的关系；二是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就前者而言，与相安无事的和谐族群关系一样，不同强度的族群冲突在全球范围内也是社会常态，国家就是协调这种冲突的制度化角色。而就国家认同而言，后者才是真正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即族裔民族主义运动可能反对国家，甚至追求独立。因此，国家为谋求长治久安，在民族问题上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抑制族裔民族主义运动的发生和成长。国家的敌人从来不是文化多样性本身，而是以文化多元主义、差异化、自我文化中心主义为价值资源的族裔民族主义运动。

在国家反族裔民族主义运动的举措之中，知识说理是关键一环。

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当下知识界的表现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关于国家认同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总体上未能提供促成共识、感召人心的核心知识资源，甚至陷入对于非根本性问题无休止的学术争论当中无法自拔。这种情况的根源部分在于相关知识积累和知识界能够提供的有效知识助力不足。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研究界亟须知识创新，实质性提高理论建构的反思性和系统性水准，基于中国社会的经验现实，突破西方知识霸权语境下各种西方中心主义认识论的局限，探索凝聚中国社会之清晰学理。

在一体性基础上理解多样性

施爱东¹

中国现代民俗学似乎并没有很好地“现代化”，就已经被“后现代”的哲学思潮裹挟着进入了一个碎片化的学术时代。

自从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发布以来，尊重和保护文化多样性不仅成为一种政治伦理，也成为一种学术伦理，进而演化为一种学术取向。这在民俗学科中也有些具体表现，那就是社区细描研究的逐渐盛行。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通过，更是将民俗学卷入一场持久的“非遗保护运动”。非遗研究结合社区细描，结果是民俗学的碎片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更是强调“每一社区、群体或个人应评定其所持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而这种遗产不应受制于外部的价值或意义评判”，将价值认定的边界，收缩在一个遗产项目的社区共享边界之内。

地方政府为了使一个非遗项目成功纳入代表作名录，总是着力强调该项目的独特性，而学者也常常把“特色”当作一个项目是否具有代表性的评判标准。当我们把这一标准代入学术研究的时候，“文化特色”的追求很快催化出一种简单的知识生产模式。我们只要翻一翻21世纪的民俗学学位论文就会发现，“介绍田野点-聚焦遗产项目-追溯传统-概述日常生活-细描仪式特征-访谈传承人-作出文化阐释”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书写模式。它让一个刚入学不久的硕士生就可以快速沉入田野进行“民俗研究”。

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文化多样性应该得到保护和尊重，但学术研究如果过度强调和追求文化独特性，就会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封闭的细描。民俗研究从传统的遗留物研究，到类型研究，到事象研究，再到如今的非遗项目研究，由远及近、由普遍到个别、由概述到深描、由偏重于“俗”的研究向偏重于“民”的研究的转变，折射了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反映了学术研究不断精细化的进程，但也带来了民俗研究不断碎片化的隐忧。

民俗学者如果缺乏中华民族广泛性、共同性民俗知识的储备，缺乏通盘的眼光、比较的能力，就很容易沉浸于琐碎的知识海洋，无力纲举目张，失去在现象中发现规律、在一体性格局中理解多样性的学术能力。换句话说，对多样性文化和社区文化独特性的过度强调，事实上将文化共同体无限收缩在一个个乡村非遗项目的共享圈内。民间文化遗产被分割、被封锁，如果再因“知识产权”观念而进一步私有化，就很可能伤害到民间文化在各民族之间不断流动、交融、变异、发展的存续方式。这对于我们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有一定消解作用的。

所谓后现代，是基于现代性而衍生的文化思潮。只有在现代性的基础上理解后现代，才是马克思主义“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所以说，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知识的建构和积累，对于共性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质的阐释和理解，是民俗学专业基础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只有在中华民族一体性认识的基础上进入民俗研究，才能突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知识蔽障，更加深刻地理解多样性文化的作用和意义。

民族理论视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严庆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无疑是民族理论研究的“本行”。作为民族学下的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既在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揭示着民族及其发展的规律，又在规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学的发展走向。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民族理论可能要侧重以下方面：

一、理路、话语：凸显中国特色与中国风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特色，聚积于自身的开拓创新，反衬于中外比较对照。呈现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建设理路，必然要回应西方逆全球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的研究与影响。在民族主义盛行的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服务于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政治认同培塑工程，超越族裔民族主义负效应的羁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珍爱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理念信奉与规则恪守。政治认同是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是可以超越各民族文化差异的国家制度赞同和政治运行认可，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是承继历史与未来，联结民族与国家的政治认同。可以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建设理论的标志性话语，也是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建设实践的重要抓手。

二、维度、切入：潜心学术探究与学理阐释

重视求知的年月，人们满足于知道是什么；而在追求理性的时代，人们会更多地追问为什么。阐释、传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理论研究的重大议题，在具体探究中有几点值得注意：从历时维度，研究本民族与他民族之间，各民族之间文化本质层面（语言、文字、文化形式差异之上）的真、善、美共性，研究中华文明与各民族文化精华之间的关系。从空间维度，研究民族走廊对相关民族的融通作用。从国家与社会、市场关系的维度，研究区域性发展对相关民族的浸润整合效应，研究中央治辖对于各民族、各地域的统合作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对于各民族共同性因素的增量效应；研究现代化进程引发的民族社会结构变迁、社会流动、社会分工对认同复杂化、团结有机化的影响；研究国家能力增长对于国民荣誉感、幸福感、获得感以及国家认同的影响；细化边疆建设与治理研究，深入开展跨境民族问题研

¹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究，垒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认同“院墙”；研究互联网技术与平台如何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等。

三、寻位、格局：强化使命担当与大道关怀

学术研判的钟摆切忌摇摆在应然主张与抽象镜像之间，而应更多地对准客观的坐标。学科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服务国家、造福民众方面，学科的理性主要来自对研究对象的客观反映。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民族事象发生了快速、全面、深刻的变革，研究者既要在理念、方法上与时俱进，更要在格局上“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而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要注重“各美其美”，更要注重“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同时，注意联通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

中国边疆学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冯建勇¹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思想，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核心理念。缘于民族和边疆在地理空间上具有一定的重叠性，中国边疆研究者对此议题亦颇关注。在此不揣粗陋，拟从历史、理论、实践三个维度，简要阐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理路。

第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从历史疆域理论层面阐明边疆民族地区是中华民族共有家园的组成部分。

如果以历史主义的视角观察中国边疆的知识话语体系构建，我们会发现，由于经济、社会、文化影响力以及知识生产与知识体系构建能力的差异性，无论是王朝国家时代的边疆认知，还是民族国家时代的边疆知识体系，多数时候，有关边疆的知识话语体系是由“他者”来构建和表述的。其结果是，近代以降，发端于西方学界的西方中心主义史观，将中国边疆变成了一种基于西方经验而发的“异域想象”，历代中央政府经营边疆的历史多被傲慢地解读为“殖民的历史”。作为因应，我们有必要立足于中国本土的传统历史资源与当下政治实践，破解西方殖民主义史观提倡的“长城以外非中国”等错误观点，考察自古至今中国疆域版图内各民族交流、互动的一般情形，借以揭明西藏、新疆、内蒙古等边疆民族地区是中华民族共有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历史疆域理论。

第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亟应从马克思主义国家与边疆理论视角揭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之关联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明确提出，一个国家内部终将实现从“分离的民族文化”到“各民族的共同文化”的转变。原来，随着现代化大工业生产时代的到来，自由贸易和统一市场必定成为消弭民族藩篱的集中性力量，“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民族文化发展路径的论述，虽然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但仍可为当下中国边疆民族文化的发展路径提供一种方法论。回到中国实践层面，通过区域协调发展、西部大开发、沿边开发与开放等重大战略之实施，各民族在发展中交往交流交融，形成共有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这将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进路。

第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应认识到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亦“内”亦“外”的复杂性。

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的“内”与“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边疆议题的多元性。一个具体的边疆民族议题，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还可能发散为一个双边或国际议题，如近

¹ 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年西方国家不断借中国边疆民族、宗教问题，实施对中国的阻遏和打压。二是边疆空间的开放性。以跨境民族为例，其与邻国的民族拥有相似的文化心理特征，有可能形成超越国界的凝聚力。有鉴于此诸议题直接关涉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从世界大变局的视野认知新时代中国边疆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高度重视边疆治理的“内”“外”互动关系。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社会学何为？

郝亚明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注定是一项意义深远但又充满挑战的系统性工程。它既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在实践中的精心培育，又需要不同学科在理论上的持续浇灌。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多维的理解，从人与民族社会性的角度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诚然是社会共同体，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也必然以各族人民共同的社会生活为起点和依托。基于此种认识，民族社会学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进程中大有可为。从本学科的传统和优势出发，当前可以尝试在以下两方面重点推进：

一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体”意涵进行深度挖掘。尽管有学者指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关表述中，“共同体”具有中心词与元概念的属性，但甚少有人从共同体的视角去审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与内涵。现有大多数研究要么在实质上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简单等同于中华民族，暗含着共同体只是一种补充性或修饰性表达的认定；要么将共同体与多元一体中的“一体”关联起来，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单纯强调。无论是忽视共同体意涵还是对共同体意涵的简单化理解，显然都不利于全面透彻地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共同体理论脉络的梳理，是准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性质与特征的基础。从早期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以“共同体”与“社会”相对立的视角展开对共同体意涵的探讨，再到近代社会学学科以“社区”的名义接过共同体研究的大旗，都充分说明民族社会学具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共同体”意涵进行深入探究的学科禀赋和研究旨趣。

二是围绕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这一主题积极开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一个多民族社会中，如果没有各民族深入、全面、持续的交往交流交融，期望铸牢共同体意识无疑是镜花水月般的虚妄幻想。从这个角度而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所在。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相关研究过程中，必须坚持以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为抓手。从议题重要性角度来讲，在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个过程中，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是不可替代的重要环节。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区环境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空间基础，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则催生了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其在形成后又成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构基础。从学科传统来看，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社区”，都是社会学相关学科的核心分析概念。在这两个核心概念的统帅之下，可以将族际交往互动、族际居住格局、民族社会分层、城市民族工作、民族人口流动、民族关系、族际通婚等传统民族社会学的研究议题串联贯通起来，形成研究合力，以社会实践的形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业提供支撑力量和推动力量。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途径

李 静²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工程，需要多学科共同研究。就“意识”本体而言，它是哲学和心理学的传统问题，因而从民族心理学出发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可以触及其本质问题。

¹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² 兰州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首席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群体意识，这个群体意识包括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以及民族凝聚力、自尊心、自豪感等一系列的认知、情感和行为要素，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中华民族共同体心理是各民族在共生空间、大一统政治、互补经济、同拓疆域以及共建文化等过程中，经过不断的民族互动、社会交往而产生的。同时，在此过程中不断聚拢、凝聚而形成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群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亦伴随着社会心理发展的始终，是一个动态过程，成为中华民族群体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起步于共知共知

共同认知。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重要文化符号的认知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开端。这是个信息指标，亦是个信息加工过程。从知到认知，再到共同的认知，是从个体层面到集体层面的认知过程。铸牢共同体意识要以共同的认知作为心理基础，生活于共同地域、经历了共同事件并创造了许多共性文化符号的人们共同体，在对周围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认知上必然有着共同的认知符号和心理响应，这些都是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开端和基础。

二、淬火于共情

理解他人的立场和感受的能力即共情，亦称为“同理心”。据现有科学的理解，共情来自几个心理过程的共同作用，即读心、情感匹配和共情动机。对一个共同体关心、维护、热爱以及为其自豪等均源自相应的情感体验，而共情是人与人、人与集体情感连接的重要纽带。同时，共情也是衡量亲群体、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心理与共同体意识维系的重要纽带。

三、趋同于共思

共思，亦可称为“共想”，即共性思维。思维是人类的高级心理活动，这里笔者强调的是思维的内容和方式。恩格斯指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想什么和如何想取决于我们生活的客观世界，它决定了思维的内容及思考的方式。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其思维内容、思维方式因其所生活的共同地域、所经历的共同生活以及面对的共同问题等表现出趋同性。群体或共同体表现出的思维活动是其重要的心理过程，对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的凝结作用。

四、与共于共忆

共忆——共同记忆。心理学研究发现，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社会群体或组织都有相应的历史记忆和集体记忆，记忆本身就具有群体性、相互影响性和带动性。中华民族从历史走来，凝结成一个共同体，一个显著的心理特征就是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社会记忆，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反之，一个历史断裂、集体失忆的民族将不会长期存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不能忽略的就是加强中华民族的历史教育，凝结现实集体记忆的共性文化因子，这是我们的认同根基，亦是维系共同体的重要纽带。

五、凝聚于共育

共育——共同培育、共建精神家园和价值体系。共同体之所以是共同体，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有共同的信仰和价值体系，有共享的精神家园，这是共同体的精神归宿，亦是人类需求的最高层次，同时也是高级心理活动的反应。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中华各民族组成的，中华文化亦是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所以，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身的精神需求。从认知、情感、思维、记忆、培育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知、共情、共思、共忆、共育”，这是共同体意识的心理过程，亦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的心理指标和重要的心理途径。就民族心理视域的分析来看，认识到“五共”心理过程对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意义重大，有助于从内部效度深入推动各民族在心理层面上的包容亲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

依法规约：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之基



田钊平¹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妥善处理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的关系，促进各民族公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关切从“自在”向“自觉”转变、从感性向理性提升，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和关键环节。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充分发挥法治的功能和作用，是引导各民族公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路径。为此，应超越传统的民族法治思维，加强民族法治建设，以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之基。

第一，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价值引领。在 2018 年宪法修改前，民族法治建设主要以维护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和繁荣发展为价值目标。2018 年宪法修正案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在根本法上肯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提升了民族法治价值理念，形成了由维护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三层次目标构成的目的价值体系。从逻辑关系上讲，维护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是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前提；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是民族法治建设的最终目标。因此，应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价值引领，加强民族法治建设，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促进各民族交融，为引导各民族公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客观基础。

第二，探究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何以纳入法治化轨道。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民族法治建设既要重视各民族的关系及各民族发展问题，更要关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问题。在 2018 年以前，民族法治建设主要以调整各民族关系、保障少数民族权益为重心，对整体与部分、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协调，主要通过强调各民族公民应承担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团结的义务来实现。“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形象地说，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引导各民族公民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关注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事业，将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纳入法治轨道，就构成了当前民族法治建设的重要议题。

第三，积极探索各民族共性生成、巩固与发展的法治途径。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共性，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维系各民族公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关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因此，在民族法治建设中，既要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纳入法治轨道，消除影响族际关系良性发展的制约因素，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要顺应各民族共性不断增多、差异不断缩小的发展趋势，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各民族共性的生成、巩固与发展。为此，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宪法有关规定为切入点，适应引导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需要，对民族法治实践进行反思性研究。厘清协调各民族关系的宪法原则的实质内涵、基本制度的功能定位及实施机制的核心要求，推进必要的法律修改和完善，建立引导各民族共性生成与发展、促进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保障体系。

着力推进学校教育文化选择研究

巴战龙²

如果从 1905 年王国维先生在汉语学界提出“教育的人类学”术语算起，那么教育人类学在中国已有 115 年的发展史。回顾学科发展史，可以 1979 年 3 月社会学恢复重建为界限，把教育人类学发展史简略地划分为“有实无名”和“有实有名”两个阶段。随着社会科学的恢复重

¹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²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建和积极拓展，教育人类学又先后经过引介普及、初步探索和拓展提升三个发展阶段，逐步成为一门既兼收并蓄又相对独立的社会科学。

当前，教育人类学如何进一步革故鼎新、持续进步，是学界亟须思考的问题。2017年，笔者不揣浅陋，针对“归属+对象+方法”的教育人类学传统界说范式早已无法自圆其说的现实困境，提出了一个试验性的“新”教育人类学的界说构想。这一“论题+主题+策略”的构想由三个彼此关联、相辅相成的观点组成：（1）教育人类学的根本研究论题是现代性与多样性的关系问题；（2）教育人类学的核心研究主题是学校教育文化选择问题；（3）教育人类学的主要研究策略是案例研究。笔者期望，“新”教育人类学的研究实践能重塑这门学科的知识生产能力，使其走上“积累性知识生产”和“标志性作品打造”两轮驱动的学科发展之路。

回顾这门学科的深层研究理路，可以概括为两种，即改革开放前的“教育与国家建设”和改革开放之后的“教育与现代化建设”，而贯穿在这两种研究理路始终的则是“教育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再次提上了社会政治议程，先提出要“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继而提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党的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两份纲领性文献都对文化认同极为重视。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9年9月，总书记又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论述：“坚持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并倡导“各民族在文化上要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之道是增强中华文化认同，而中华文化认同需要在具体场域中通过特定的资源和规则培育和形塑。从教育人类学视角观察，增强人们的中华文化认同，在“后义务教育”时代关键在于作好学校教育文化选择。作好学校教育文化选择，前提是处理各民族文化、中华文化和全球文化的关系，关键是建设好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分工协作体系，原则是把民族平等这个立国根本原则，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个基本国情，把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这个各民族的最高利益讲清楚、说明白。

综上所述，教育人类学学者应通过扎实的经验研究来着力推进学校教育文化选择研究，以实现既担负时代责任又促进学科发展的双重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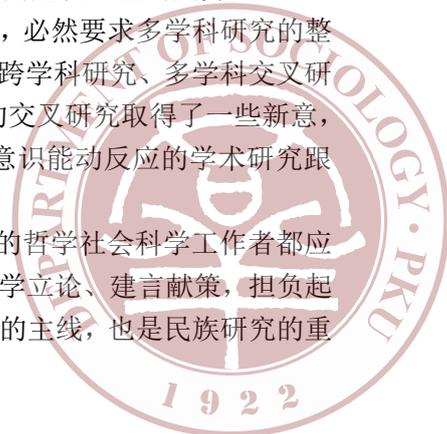
策划人语：

近年来，每每参加跨学科的会议或交流，总是获得诸多启发与感悟；每每举步田野，总是感受到民族生活的鲜活与灵动；每每旁观一些学科研究的勃兴与式微，总是发问学科研究的初衷与本真。

人类社会的统一性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性和综合性。社会科学在第三次分化之后，呈现为社会科学自身的分化，各学科在加强深入、微观研究的同时，也不知不觉累积起各自“专业”而“特色”的壁垒，有人曾称之为一定程度的学科研究“巴尔干化”，衍生的后果则是对研究客体的各自分切。反思之后，学科研究的跨界与多学科交叉研究逐步成为越发凸显的趋势。

民族因素和民族议题的日益社会化，多民族国家建设议题的宏大，必然要求多学科研究的整合，不时出现的精彩的跨界研究作品启示我们：以主题研究为龙头的跨学科研究、多学科交叉研究势在必行。近年来，民族学研究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取得了一些新意，这是对民族因素越来越嵌合于社会整体的“事实”尊重，也是作为意识能动反应的学术研究跟进。

学术研究追寻真理，学人使命服务人民。“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研究的重



大议题。同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其相关研究无疑也是一个能够聚合各学科学理、学力的优选题。

自然界中，彩虹的绚丽源于原色与过渡色的交织融汇；学术界内，聚力的精彩在于不同学科的智慧交彻。为此，《西北民族研究》特设笔谈栏目，旨在聚集优秀中青年学者的情怀与理性，以期实现“发问于苍穹—采撷于田野—笔耕于案头—聚芳于笔谈”的多维交流，共担学人使命。

——严庆 2020年3月15日

【论 文】

美国当代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¹

孔 元²

内容提要：美国当代保守主义既是一场观念运动，又是一场政治运动。它产生于冷战时期，目的是为了应对苏联的挑战。在苏联解体后，它发展成推动全球化的重要思想观念。全球化造成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激化了美国的社会矛盾，并最终导致特朗普上台。这一政治动向在思想上表现为保守主义阵营的分裂，民族保守主义成为一股新的思想和政治力量，它为民族主义辩护，试图借助国家力量解决美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并因此成为支撑特朗普执政的重要思想来源。理解这一新的动向，对于把握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的思想走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导言

2019年3月，美国保守派期刊《首要事务》（First Things）刊发了一封宣言式的联名信——《反对过时的共识》，引发美国保守派阵营内讧。该宣言指出，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充分暴露出美国保守主义阵营的内部分裂，保守派在特朗普竞选问题上分化为不同的派系。在特朗普上台之后，经过两年多的分化重组，新的保守主义立场开始明晰化，各方逐渐意识到，随着2016年特朗普的胜选，旧的保守主义共识已经瓦解，任何试图复兴前特朗普时代的保守主义共识的努力不仅有误导性，而且甚至是有害的。宣言呼吁，承认冷战期间旧保守主义共识在对抗共产主义方面的贡献，不意味着要守着僵死的教条，而是应当在政治时变中寻找新的共识。

无独有偶，2019年7月14-16日，在埃德蒙·伯克基金会的赞助下，一群对现状不满的保守主义政客和评论家聚集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了一场“民族保守主义会议”。在会议演讲中，以色列哲学家、埃德蒙·伯克基金会主席约拉姆·哈扎尼（Yoram Hazony）宣称：“今天是我们的独立日。我们宣布跟新保守主义决裂，我们宣布跟新自由主义、经济放任主义决裂，跟人们所称的古典自由主义决裂。有一样东西联合了我们所有人，那就是民族保守主义。”^[1]

在这群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推动下，美国保守主义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下出现了强劲的复兴。伴随着这一思想复兴运动，在二战之后勃兴的美国当代保守主义也进入新一轮的思想转换期，并在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枷锁中发展为一场具有强烈批判性和革命性的新的思想和政治运动。

¹ 本文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1期，发表有删节。<https://mp.weixin.qq.com/s/hnuNt-ixpjfkyHp04rNJA> (2020-4-13)

²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